

韩国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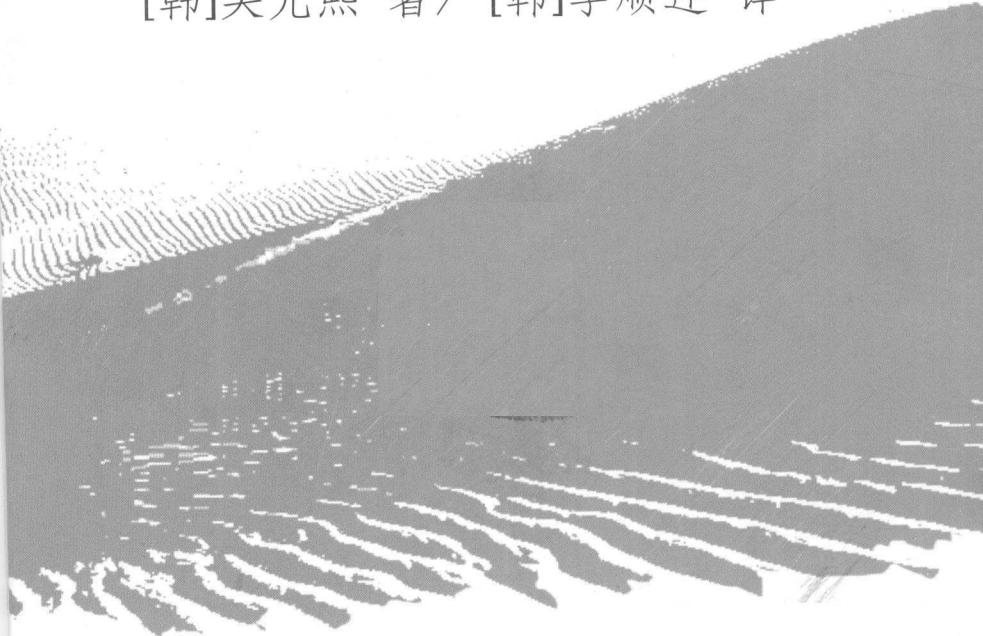
沧江金泽荣研究

[韩]吴允熙 著 / [韩]李顺连 译

3. 125=51

JZR
W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国研究丛书

沧江金泽荣研究

[韩]吴允熙 著 / [韩]李顺连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武汉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江金泽荣研究 / [韩] 吴允熙 著 [韩] 李顺连 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
(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5622-2606-7/K·154

I. 沧… II. ①吴… ②李… III. 金泽荣—人物研究
IV. K833.12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8904 号

沧江金泽荣研究

④ [韩] 吴允熙 著
[韩] 李顺连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洪胜非

封面设计：新视点

责任校对：崔毅然

督 印：方汉江

开本：850 mm×1168 mm 1/32 插页 2 印张：9.125

字数：227 千字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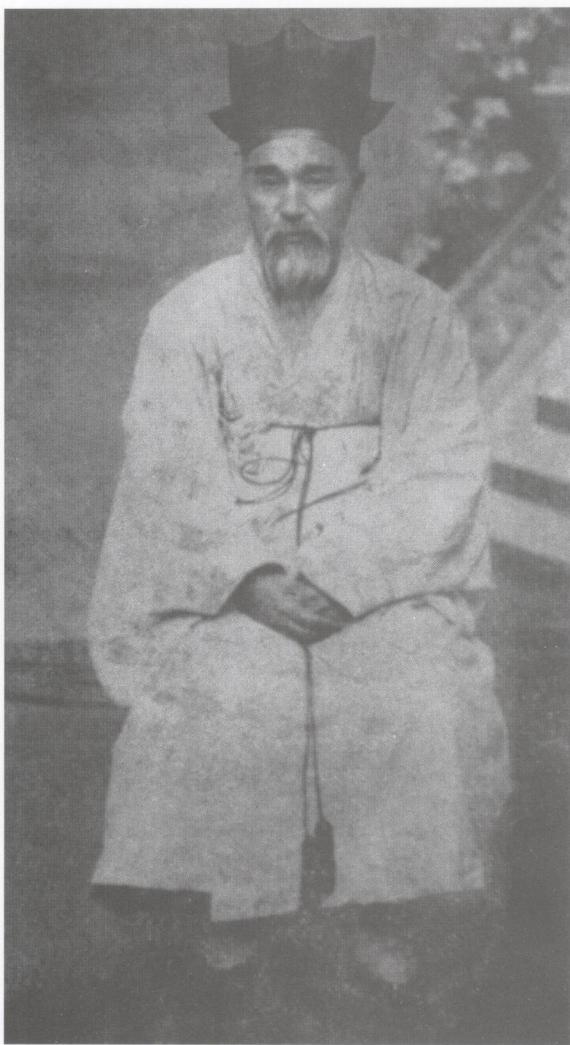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洪胜非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新视点

定价：22.00元

ISBN 7-5622-2606-7



9 787562 226062 >



金泽荣像



前排：左 黄鲁山 右 张峰石
后排：左 张峡亭 中 金沧江 右 张益之

金泽荣——中韩文化交流 的友好使者（代序）

章开沅

金泽荣是李朝后期四大文豪之一^[1]。张謇是清朝末年崛起的大企业家。他们从1882年在汉城结识，到1905年金泽荣迁南通定居22年，前后诗文唱和有34年之久^[2]。他们遗留的作品是那个时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通过这个个案研究，探讨清末民初中韩文化交流的某些历史特征。

（一）

张謇1853年（清咸丰三年）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受传统儒学教育，15岁（1868年）取中秀才，但此后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且因家贫20岁即开始在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1876年由于受到吴长庆的赏识，改投庆军幕府。1882年夏季，29岁的张謇作为主要幕僚随庆军前往朝鲜参与“壬午之役”，在汉城工作一直到次年冬天才回故乡。

[1] 据宋天镐《金泽荣文学中的中国文人思想考察》，译文载于《金淹江研究》第3辑，南通金淹江研究所编，2001年。

[2] 张謇死于1926年，先于金泽荣一年。

张謇结识的第一个朝鲜友人是吏部参判金允植（洵卿），并且由于他的介绍才结识了当时已颇有文名的金泽荣。张謇以后曾回忆说：“往岁壬午，朝鲜乱。謇参吴武壮（长庆）军事，次于汉城。金参判允植颇称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其诗直窥晚唐人之室，参判称固不虚。间辄往还，欢然融洽。沧江复为言其老辈申紫霞诗才之高，推服之甚至。予亦偶从他处见申所流传者，盖出入于晚唐北宋之间。”^[1]

金泽荣号沧江，1850年（旧韩熙伦王元年）出生于开城府一个书香世家。17岁（1866年）通过汉城府成均初试，但此后在考场上也是如同张謇那样屡次失利。23岁以后对科举应试日渐厌倦，读中国明朝人归有光的文章忽有所悟，兴趣遂转入研习古文。24岁在汉城与同为李朝后期四大文豪之一的李建昌结识，志趣相投，论文赋诗，声誉鹊起。因此，“壬午兵变”平息后，金允植才把他介绍给也同样爱好桐城派古文的张謇^[2]。张謇曾赠给纸墨，并以“东来无所得，得公诗为宝”的诗句表达相见的欣喜，金泽荣也撰《黑风吹海》一诗回赠^[3]。

张謇回国以后，再也未能重游朝鲜，但他却与朝鲜许多爱国文士结下颇为深厚的友谊，并且终生关心这个友好邻邦的处境与命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如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役、清末新政与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的先后死亡，以及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同时勃兴等等。随着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局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张謇本身的地位与历史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于

[1] 张謇：《金沧江刊申紫霞诗集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2] 据蔡观明编《金沧江年谱》，手稿原件藏于南通图书馆。

[3] 参考前引宋天镐文。

1885年中举，1894年虽然迟暮却又高取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并且卷入帝后与新旧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甲午战争以后，他决定性地转而从事兴办新式工业（大生纱厂等），同时也创办新式学堂和文化事业（如通州师范、博物苑等），成为声望倾动东南的头号绅商，1906年以后更成为全国立宪运动的领袖。

在此期间，朝鲜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如1884年的开化党政变，1894年日本借口东学党事件出兵朝鲜并且大败清军，此后日本加快了对朝鲜的侵略步伐，而旧韩统治集团内部也充满着复杂而又激烈的纷争。金泽荣和张謇一样，也是历经试场蹉跎，直到41岁（1891年）才通过会试取中进士，先后任议政府主事秉编史局编修、内閣纪录局史籍课长、弘文馆纂辑所委员等职。但与张謇有所不同的是，他并未过多卷入政争，也没有弃仕从商，而是利用自己清闲的岁月撰写了大量的诗文。但是金泽荣并不满足于官位的提升与学术的成果累累，他的内心充满着对于祖国危亡的忧虑，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事实上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大韩帝国被剥夺了外交权，连学校课本也难以保持民族精神。金泽荣痛惜之极，决心走上流亡中国的道路。

（二）

关于金泽荣来华，张謇曾记其事云：“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将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孥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紫霞诗刊稿本也。”^[1]仓皇出走，行李萧然，却不忘随身携带手抄的申紫霞（纬）千余首诗稿，真可以称得上对文学的痴迷。张

[1] 张謇：《金沧江刊申紫霞诗集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睿同情其悲惨遭遇，更钦佩其品格高尚，便安排他到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编校，并购买房宅于东濠河之侧供其居住。由于书局对他的照顾，编校工作并非繁重，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自己的学术撰述。

沧江在生活稍得安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事申紫霞诗集的编辑。1906年冬选定清稿，1907年由翰墨林印书局铅印线装（二册），共印一千部，几乎全被朝鲜购去，可见紫霞诗之受韩人喜爱。张睿为之作序云：“沧江于紫霞之诗，可谓有颠嗜者矣。比与余书：子方劫劫然忧天下之不活，而仆忧一诗人之不传，度量相越甚远。余语沧江：活天下难，若子传一诗人亦不易。相与大笑。”盖以沧江薪俸收入不丰，自行编选刊印申紫霞诗近千篇，其艰难可想而知也。张睿序文的结语是：“紫霞之诗，诗之美者也，沧江学之而工，而辛苦以传之不迂。独念金参判（允植）年过七十，以孤忠窜海岛，不能复有握手谈诗之一日。见沧江所编紫霞之诗，得毋有人事离合相形之慨也乎！”^[1]朝鲜之行始终是张睿难忘的记忆，特别是对那些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韩国挚友，张睿更满怀思念之情。

但金泽荣（沧江）更多的精力却是用于编写韩国历史。据南通市图书馆和博物馆合编《金泽荣撰辑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先后印行的有《韩国历代小史》（十三卷，1915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九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正误本，1924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九册）、《韩国历代小史》（最后正误本，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线装）、《校正三国史记》^[2]（五十卷，1916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

[1] 张睿：《金沧江刊申紫霞诗集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2] 《三国史记》为高丽金富轼撰。三国指新罗、高句丽、百济。

装四册)、《新高丽史》(五十三卷, 目录一卷, 系郑麟趾《高丽史》的增修本, 另有《正误》一卷, 1924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 线装十四册)、《朝史纂》(六卷, 1914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 线装三册)、《高丽季世忠臣逸事传》(一卷, 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 线装一册)、《重编韩代崧阳著旧传》(二卷, 1920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 线装一册)、《(金泽荣)年略》(一卷, 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 线装一册)等。

金泽荣勤奋撰史之良苦用心, 张謇对此也理解甚为真切。其《韩国历代小史序》云: “今李氏朝鲜忽焉墟于邻, 并其三千二百余之国社斬矣。金君沧江当其国是抢攘之际, 尝一试为吏官。度与其志与所学拂戾不能容, 而国将不国, 乃独懔坚冰且至之瞿, 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志, 带妻子而来中国, 以为庶几近孔子而中国居也。既至, 不十年, 国遂为人摧践以亡。而其祖宗邱墓所在, 故国禾黍之悲, 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终李氏朝鲜之事, 成《韩史纂》。居数年, 以其书合之于前所作《韩国历代小史》为一书, 以仿虞书冠尧典之义。甚矣! 金君之用力勤, 而其志可悲也。庄生有言, 哀莫大于心死, 而身死次之。嗟乎! 此以人而言也。言乎国, 则謇独以为哀莫大于史亡, 而国亡次之。国亡则死此一系耳, 史亡不惟死不幸而绝之国, 将并死此一国后来庶乎有耻之人。金君叙一国三千二百余年事, 可观可怨可法可戒者略备矣。谓以供人观怨而法戒, 如是焉差可也。韩之人抱持纶一旅楚三户之志者伙矣。艰哉! 读金君书, 其亦有慄然而想, 瞠然而忧, 窃蹠然因而弥厉者乎!”^[1]把历史看作国魂之所寄, 把史亡看作比国亡更为悲哀, 把撰史看作维系民族精神的大业, 把史书看作鼓舞民心寻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 这是张謇与金泽荣共具的卓识, 也正是中韩传统文化相互契合之处。

[1] 此文收于《张季子九录·文录》。

除史书撰辑外，金泽荣还整理、纂辑、出版了若干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如《丽韩十家文钞》（十一卷，1915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二册，十家指金富轼、李齐贤、张维、李植、金昌协、朴趾源、洪周、金迈淳、李建昌、金泽荣）、《梅泉集》（七卷，续集三卷，黄铉撰，金泽荣选，1911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重编朴燕岩先生文集》（七卷，朴趾源撰，金泽荣评，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二册）、《崧阳耆旧诗集》（二卷，1910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古本大学私笺》（六卷，1918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等。此外，他还曾辑《箕子国历代诗》四卷，共收85人，诗230首，并附各作者小传，惜未及付梓。其用意也在于保存与宏扬韩国文化精粹，借以维系与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金泽荣毕竟是诗人，诗歌创作乃是他的生活主体与最大欢悦。从1911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沧江稿》（十四卷，诗稿四卷，文稿十卷，1911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六册）、《韶漫堂集》（十五卷，附刊一卷，收诗1041首，文463篇，1911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七册）、《韶漫堂续集》（三卷，1919年翰墨林印书局铜印本，线装一册）、《精刊韶漫堂集》（内有诗集定本六卷，文集定本卷数不详，1920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韶漫堂集》（九卷，附编二卷，1920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韶漫堂集精》（十二卷，线装四册）、《合刊韶漫堂集》（十五卷，目录二卷，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八册）、《韶漫堂全集补遗》（二卷，南通崔竟成选，1925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韩国金沧江集选》（二卷，山阴李桢选，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张謇是金泽荣诗的知音，他在《朝鲜金沧江云山韶漫堂集序》中感慨说：“朝鲜东南北介日本、俄罗斯，崎岖其间。其人独慎固风气，谨事大之礼，而不骤迁于异说。私尝窃论：鲁秉礼而后亡，朝鲜

庶凡其犹有断断之风。曾不几年，役于其国，观乎其政教与其士大夫，乃若举先王之遗，壹切芟夷而陵替之，弦诵闻如也。周辙东而王道衰，聘问歌咏犹行于列国。其贤者于是征存亡，辨得失，而不肖者犹不敢有野心以肆于恶。至一变为游说检倾之徒，日以捭阖纵横论构陷诸侯王，而天下弊矣。兹其可不为长虑却顾太息者与！晋山金沧江能为诗，隐山泽间，与之言，隤然君子也。观其业，渊思而絜趣，踵古而冥追。世纷纭趋于彼矣，沧江独抗志于空虚无人之区，穷精而不懈，自非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词，而隆污者时命，沧江其必终无悔也，故为之攬所感以序其诗。”^[1] 沧江属于当时韩国老辈士大夫，受儒学濡染甚深，且恪守传统纲常伦理，其诗自然是言志载道，以忧国忧民之作居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张謇的诗歌唱和往往是一拍即合，融洽无间。譬如南通有曹公亭，为纪念当地抗倭名将曹顶而建。张謇曾咏诗赞之：“人亦孰无死，男子要自见。曹生磊落人，无畏赴公战。鲸牙白草纤，马革黄金贱。荒原三百年，突兀一亭建。田父何所知，亦说单家店。”^[2] 金泽荣在1922年亦曾作《曹公亭歌》，诗云：“往者万历倭寇东，韩臣有李忠武公（李忠武公名舜臣，与倭数十战于海上皆胜，杀数万人，《明史》误作李舜）。奇韬妙图似神鬼，杀倭满海波涛红。当时倭儿患虐疾，背书其名胜药功。三百年后汉江竭，修罗蚀月凶肠充。使我奔伏淮之侧，白头欲举羞苍穹。奇何今日中州彦，蘧篠之病颇相同。慨然共思曹壮士，沫血击贼卫南通。奇功垂成身径陨，愤气化为青色虹。叱工筑亭安厥像，横刀立马生长风。请君且揽新事涕；与我赊酒向新丰。一杯醉我李兵仙，一杯醉君曹鬼难。巫阳与招

[1] 此序已收入《张季子九录·文录》，系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即金氏诗集正式出版之前。

[2] 《曹公亭》，载《张季子九录·诗录》。

魂气返，旂光剑色摩虚空。雷鼓鼓动两国气，人间何代无勇忠。”^[1]此时诗人虽已年逾古稀，但仍满怀爱国豪情，呼唤韩中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发扬以李舜臣、曹顶为代表的抗击外侮的光荣传统，共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金泽荣并未完全生活于陈旧的故国之思，或者沉溺于历史的故纸堆中。他不仅关心韩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而且思想也在随着时代不断有所前进。在他来到南通的第六年，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各地革命军民纷纷响应，南通也继上海之后宣告光复。金泽荣并未伤感于素所崇奉的君主政体的消亡，反而为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欢欣鼓舞，曾作《感中国义兵事五首》，其中有“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八垓。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人日始醒来”，“箕城地灵应愧死，寥寥仅只安生”^[2]。他和张謇一样，在政治思想上都大体经历了君主、君主立宪、共和三个阶段，因而都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了民主共和制度的到来，尽管他们对民主真谛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张謇在辛亥（1911）年11月13日记上写道：“临时政府成立，是日改用阳历，适元年正月一日。至江宁。”第二天就接受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1912年1月19日（阴历为辛亥十二月一日）又提前写春节对联：“民时夏正月，国际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3]金泽荣则在民国肇建之后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自认为加入“中国新民”行列，对刚刚诞生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寄予厚望。但其著述署名仍多冠以“韩国遗民”、“朝侨”、“韩产”、“韩客”，以示永远不忘故国。朝鲜爱国志士在上海法租界组织临

[1] 此诗经费范九辑入《曹公亭诗》，1912年铅印本。

[2] 《韶漫堂集精》诗集定本，辛亥稿。箕城指朝鲜，安生指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爱国青年安重根。

[3] 以上记述均见《柳西草堂日记》相关诸日。

时政府，他立即代为拟《陈情表》，把韩中关系比喻为“为瓜为葛，为唇为齿”，希望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他与国内的爱国志士也常有联络，在衰暮之年仍然尽心尽力为光复故国而呼号。

金泽荣在南通旅居 22 年，与张謇情趣相投，私交甚笃，常相携徜徉山水，春秋雅集，岁暮消寒，因此，咏景抒情的诗文唱和也甚多。如民国五、六年期间，张謇曾作《沧江示所和诗复有赠》：“爱客攻吾短，论诗数尔强。时时惊破的，炯炯达升堂。蟠屐吟山出，蜗庐借树藏（沧江寓庐名借树）。众人怜寓卫，后世有知扬。”据曾见过泽荣者的回忆，其人“面貌清癯，鬓髯修美，一望而知为有道之士”^[1]。“或戴朝鲜纱筒帽，身着朝鲜长服”^[2]，“首缠纱巾，深衣款步……古味盎然”^[3]。读张謇的诗，一个直率而洒脱的韩国诗翁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民国八年（1919 年），张謇又有《沧江翁今年七十，不以生日告人，八月一日为延客觞翁于观万流亭，赋诗为寿，属客与翁和之》：“六七十翁发皤，旧运新运天旋螺。《春秋》惟有乱可纪（指翁作《韩史》），忧乐合以诗相摩。看花老辈应逾共，载酒佳时莫厌多。槛外朝来云物好，从容等视万流过。东北浮云屡变更，秋风落日汉阳城。南坛幕府萦吾梦，左列词曹系子情。一局烂柯嗤对奕，几时得尽话长生。引年送日须歌舞，准备缠头听玉笙。”感时怀旧，人生苦短，昔日豪情不再，惟有以诗酒歌舞自相慰藉。这大体上可以看作张、金等诗友休闲生活的写照。张謇与金泽荣唱和的诗作甚多，收于《张季子九录·诗录》，系年最后的一首，是大约写于 1924 年的《视沧江病》。此时金泽荣已 74 岁，张謇也有

[1] 俞樾：《韶濩堂集序》。

[2] 万跃西、陈修定、陈曙亭等老人口述。

[3] 陈武臣：《登临庵日记》。

71岁。诗云：“闻病抛诗叟，来探借树亭。填栖书锸被，烧匝榾连扃。扶掖怜参术，荒寒满户庭。余年犹兀兀，史笔耿丹青。”对贫病交加的沧江极表同情，并且盛赞他在衰暮之年仍能秉笔直书朝鲜历史。

张謇也始终未能忘怀远在朝鲜的那些诗友知己。当接到金允植逝世消息时，他立即写《朝鲜金居士讣至，年八十七矣，哀而歌之》长诗一首：“破晓飞来尺一纸，开缄叹嗟泪盈眦。朝鲜遗民老判书，生已无家国俱死。国何以死今匪今，主辱臣偷民怨深。强邻涎攫庇无所，昔尝语公公沈吟。自是别公四十载（癸未与公别），东海风云变光怪。居州独如宋玉何，楚人甘受张仪绐。一窜投荒不复还，国社夷墟犹负罪。李家兴废殊等闲，河山每没筭封贤。白发残生虏所假，赤心灰死天应怜。噫吁兮！朝鲜国，平壤城，李完用不死，安重根不生，命运如此非人争。居士低头惟诵经，诵经之声动鬼神。后生援剑走如水，亡秦三户岂徒然，从会九京良有以。公胡遽化九京尘，淬患缠绕八十春。回忆南坛驻军日，肠断花开洞里人（花开洞，居士草居处）。”情深意挚，沉痛感人。

(三)

金泽荣与张謇的深挚友谊与诗文唱和，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韩文化交流的风貌。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中韩两国在近代都曾经处于相近似的历史命运，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快就在所谓“脱亚论”的误导下，走上效仿西方列强的军国主义道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帜疯狂侵略亚洲邻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同处于东北亚的朝鲜与中国。中国是日本的主要侵略对象，朝鲜则是其侵华的主要桥梁。金泽荣在为

朝鲜临时政府草拟《陈情表》所说的“为瓜为葛，为唇为齿”，表达的就是这种历史形成的共识。因此，中韩之间具有历史形成的亲和感，其近代文化交流不仅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且具有更为深沉的感情交流与理念沟通，而这种文化交流又与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系。

其次，中韩都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学在近代两国文化交流中仍然是重要的精神纽带。如忠君爱国、伦理纲常等等，都是他们（特别是老辈士大夫）在交流中惯常运用的话语。但是有三点需要加以说明：一、随着西学东渐与国内诸多新的社会因素的兴起，这些古老话语承载的理念逐渐有所变化，悄悄地增添了近代民族主义内容，而日益疏离于对于一朝一姓的愚忠等腐朽纲常名教。二、也正因为如此，张謇、金泽荣等虽然都曾对旧王朝竭尽忠诚，恪守臣子大义；但终于经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走向认同民主共和。这样就使他们对儒学为基本色调的诗文唱和具有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区别于既往千余年的中韩文化交流。三、但是其传统文化的情结甚深，某些落后的消极因素不可能迅速消失，与朝贡体系相伴生的大国主义与事大主义在中韩两国老辈士大夫的诗文唱和中经常有所流露，这是应该认真加以辨析与扬弃的。

第三，中韩两国语言虽然不同，但文字则曾经可以通用，两国朝野人士常常借助笔谈互相沟通，这也是中韩文化交流比较方便之处。且不说金泽荣与张謇的大量诗文唱和，仅以南通现在尚保存的他题赠给当地其他友人的诗作、对联、屏条而言，就颇有流传价值，无论是书法还是文词。如“小梅零落柳垂，满袖清风独往时。渔店闭门人语小，一江春雨碧丝丝。”（屏条，题韩诗赠叶仲）“龙鼠升沉家国事，吾曹何以际斯辰。千秋广武英雄叹，阮步兵真是快人。”（屏条，自题近作）“村翁小舸装凫重，溪女长茭缚蟹籠。八尺过头青竹杖，我行参作野中图。”（屏条，自书旧作）“桐江春水绿如油，两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渐多奇险少，分明山色近杭州。”（屏条，